



English

下载中心

首页

网站地图

关于IWEP

研究课题

研究人员

研究成果

数据库

出版物

媒体报道

研讨会/讲座

期刊文章选登

[HTTP://WWW.IWEP.ORG.CN](http://www.iwep.org.cn)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

[\[PDF全文下载\]](#)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

——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

樊勇明

【内容提要】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区域合作进行理论解释的一种新尝试。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原来仅限于西方盟国体系内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在冷战后被不恰当地夸张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在“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下，这些“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被美国严重“私物化”，并且供应严重不足。因此有必要根据国际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形势，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一般来说，只服务和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是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被称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除特定区域外，一般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被某一个大国“私物化”的危险。同时，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涵盖范围较小，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免费搭车”的现象，避免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供应不足问题。

【关键词】 区域合作；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解读

【作者简介】 樊勇明，1949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8)01-0007-07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是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那么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虽然全球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区域合作正在成为新的国际潮流，21世纪将是区域合作的世纪。区域合作的理念正在成为众多国家对外战略的主导思想。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得到反映。为此，本文提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为区域合作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有关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提供有助于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据此可以预料，关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相关研究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新内容、新方向。

一 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及其缺陷

“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与劳务。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该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包括国防、外交、治安等公共产品以及道路、桥梁、路标、灯塔等社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国范围之内，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政府向公众征税来筹集。

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学。他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 [美]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

著，宋承先、洪文达译：《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页。这一观点后来被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展成“霸权稳定论”，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所构成的体系正是典型的霸权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体系。对此，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肯定国际体系为国际社会带来稳定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它的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privatization）”一般而言，“私物化”是指有人把公家的物品变为他个人私有或私用，服务于私人的目的。这里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是借用了这一现象，意指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国之私，把原本该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产品变为美国从国际社会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危险；二是“免费搭车”现象引起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金德尔伯格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的必然性。他认为霸权几乎必然存在剥削，并一再强调责任可能会退化为剥削，剥削的实质是运用权力比不用权力会产生更加有利的结果。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尽量把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特征日益明显，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世界货币。二战后，美国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国力取得霸主国地位，逐步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不可否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体系对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美国也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打上“最终解释权归美国”的字样，将国际公共产品变成美国攫取自身国际战略利益的工具。

同样，罗伯特·吉尔平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做了充分的理论探索。他在其成名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分析说，由于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霸主国的衰退不可避免，同时还因为存在“免费搭车”行为，霸主国往往在长时期内为保持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付出远远超过它应该承担的费用，令其蒙受额外损失，加速衰败。〔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二 冷战后全球化的推进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

.....

三 区域合作高潮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

四 东亚合作中对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东亚合作就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历史认识、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对美欧依赖程度不同等诸多问题，合作的形式比较松散，建立如同欧盟那样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进程更是十分缓慢。

危机往往是打破僵局的契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不仅认识到以单打独斗抵御金融危机的方式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巨大的风险，而且从美国在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更认识到了区域内互助努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度被人看做是“全球经济守夜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亚洲国家施加的羞辱性条件刺激了亚洲国家寻找区域性的替代物，新机制开始酝酿。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金融合作机制由此启动，其核心是寻求“最后贷款人”。先是有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提议，紧接着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发起的《清迈倡议》（CMI）开始运转，其后亚洲债券市场迅速形成，不久“亚洲一揽子货币”的构想浮出水面，2006年初虚拟的“亚元计价单位”开始发布。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东盟和中日韩（“10+3”）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额等数据，编制和公布了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ACU）。2007年5月初，

“10+3”财长会议决定，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外汇储备库，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之覆辙。尽管这离最终的亚洲货币基金尚有一定距离，但13个国家联合起来，将各自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到一个共同的储备库中，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货币危机时都可以动用，这本身就是地区性金融结构中“最后贷款人”的雏形。如果这一机制得以形成和发展，从单纯的区域危机防范互助体系到区域货币基金，再到单一的区域货币，那正是欧洲国家走过的道路。当然，人们不应忽视，《清迈倡议》中达成的双边货币互换资金有90%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美\兰德·亨宁著，陈敏强译：《东亚金融合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目前，《清迈倡议》并非绕开全球多边组织，而仅仅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这一方面说明了提供金融领域内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之间是互补的，不是简单的替代和否定。

在安全机制方面，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让人们看到了建立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雏形。与欧洲不同的是，即使在冷战时期，亚洲也没有出现过囊括全亚洲，或覆盖东亚地区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华沙条约组织的机构，除《日美安保条约》外，没有成型而又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在安全领域内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东亚各国更富有戏剧性和创造性。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谈起，但一直形不成势头，直到“大浦洞”导弹升空、宁边核试验成功，有关国家才真正坐到一起来协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途径。一旦开始协商对话，才发现彼此间有着这么多的共同需求、共同的利害关系，于是越谈议题越广、越谈越有成果。先是就朝鲜的宁边“去核化”达成协议，第五轮六方会谈中达成的“二一三共同文件”便是六方在多轮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阶段性成果。虽然这离朝鲜半岛真正的“非核化”尚有距离，但这种模式已经为提供东亚地区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奠定了基础。现在，这一安全机制还在发展。美朝关系正常化也提上了六方会谈议程，日朝之间也在六方会谈的“水面下动作”。可见，一个各方都需要的机制和框架在解决地区重大问题上是多么重要。

六方会谈开创了一个在安全问题上多边平等协商的范例。众所周知，由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一直握有特别话语权。但是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相关国家平等协商，尽管美国参与会谈，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主角，不再握有唯一的话语权，单边主义被多边协商取代。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区域特性。所谓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指供需的平衡，是指被提供出来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正是区域内所有国家所共同需要的，是维护区域内所有国家利益的。在霸权体制下，安全机制的供需平衡是以霸权国的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为转移的。霸权国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和运转的支出与关注是以其自身安全是否有足够的保障为限度的。但是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只是当事国之一，韩国、日本对此有着比美国更为迫切的利害关系。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近邻也无法置身事外。对地区安全关切度的急剧升温是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有了共同的关切，才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

东亚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尚在探索建立的过程中，除上述金融和安全的合作进展之外，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筹组也正在进行中。中国、日本和韩国已经大体上分别同东盟十国确定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国与韩国、韩国与日本也各自开始了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日之间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酝酿。亚洲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已经指出，东亚地区经济联系持续强化的政治意义是：“当日益增长的地区贸易和投资联系塑造了比过去更强的地区认同时，亚洲国家之间在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会得到弥合。”东亚国家能否在金融和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克服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障碍，从而形成一整套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机制，是东亚能否成为“世界第三极”、21世纪能否成为“亚太世纪”的关键。

五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区域化和全球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区域性力量不是对全球性力量的否定，而是对全球性力量缺失的补充。由于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使本来应为全球社会服务的国际公共产品日益成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攫取私利的工具，结果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维护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必然趋势，也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这是全球范围

内出现区域合作浪潮的根本原因。欧盟已经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几十年，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如今，作为“世界第三极”的东亚地区也开始向区域合作迈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而且有能力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10-21]

[修回日期：2007-11-25]

[责任编辑：谭秀英]

[推荐好友](#)

相关文章

▣ 沈骥如 八国集团应更新国际合作理念 《人民日报》2006年7月18日 (2007-1-21)

▣ 田野 国际协议自我实施的机理分析：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 (2007-1-3)

本站的署名文章均属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转载时，请事先与我们联系。

[院首页](#)

[网站声明](#)

[会员登录](#)

[联系我们](#)

[下载中心](#)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C) 2002-2008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请使用 1024*768分辨率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063 传真:010-65126180 联系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6059776号